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 交融·创新·发展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深化江南文化与岭南两地文化的交流和互鉴,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上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论坛于2023年底在上海成功举办。论坛围绕“交融·创新·发展: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题,深入探讨了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充分挖掘和利用两地文化的资源优势,发挥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当代价值,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都是中华文脉的重要支脉,在促进中华文明发展、推动中华文化传播乃至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二者又在各自独特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化脉络与精神特质,为深度探讨文化传承创新提供了现实镜鉴和广阔空间。本期城市大家谈栏目特摘编论坛主旨发言如下,以飨读者。

熊月之: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异同

改革开放以来,岭南地区与江南地区先后出现过两个对外开放前沿城市——深圳和上海。它们对外开放的历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上海正式开始实行土地批租是1988年7月8日,深圳第一块土地批租的时间是1987年12月1日,比上海早半年。但仔细地观察发现,两个城市实行土地批租的方法和路径颇为不同。

先说上海,上海是先进行论证,看土地批租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其中,上海经济学会原副会长张薰华教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当时的相关研究成果被评为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①。在此基础上,上海又找来法学方面的专家商量制定有关法律规范。鉴于当时国家层面还没有相关法律,于是先由地方层面制定出土地



批租的相关法规后才开始施行。

再看深圳,深圳开始土地批租时,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广东地方都还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此类实践也没有经过价值取向的具体论证。因此,广东当时的做法被形象地描述为“遇到绿灯往前走,看到黄灯赶紧走,碰上红灯绕着走”。

通过两座城市的对比可以看出,上海的土地批租法制特色十分鲜明,重视合规性,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订立契约、信守契约的文化传统。深圳的操作更注重实际效果,即所谓的“看准了就办”。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两个地方有类似性、相同性,都很开放,但在行事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打个比方,广东的风格如同其饮食习惯,生猛海鲜拿来就吃;苏州的风格宛如苏绣,讲求精美雅致,偏重细节。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对其共通性和差异性的仔细梳理和研究,对于研究两地的文化交流和互鉴有着重要价值。

一、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共通性

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有类似的自然禀赋。这两种文化的主要承载地都是大河三角洲,一个是长江三角洲,一个是珠江三角洲,两者均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理学上的“胡焕庸线”以东。唐代以山川形便原则划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两道为江南道和岭南道。江南和岭南从唐代开始便成为大的区域名称。

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有着类似的演进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重心经历了从西北向东南渐次转移的过程。秦汉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在西北的黄河流域,那时的南方包括江南在内地广人稀,相对落后。特别是岭南,长期被视作文化缺失的蛮荒瘴疠之地。尽管这些年长江流域的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有良渚文化、大溪文化、三星堆文化等考古发现,但是在先秦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南方的形象一直是落后的。当然,这种落后主要表现在农耕文化体系中。两晋以后,北方发生三次重大战乱,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变,与此相应地发生了三次“衣冠南渡”。大量北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的次第开发与发展,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因而逐渐发展起来。

从海洋文化方面看,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两个沿海地区均为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区,都具有悠久的与海洋联系、海洋开发、向海外发展的历史。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也有类似的近代遭遇。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之下第一批被迫开放通商的五个口岸城市以及被割让的香港岛均为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承载区。

略可补充的是,近代以前的明嘉靖年间,以葡萄牙人为主的欧洲商人曾经将位于舟山群岛附近即今天的双屿岛经营成中西贸易的基地。岛上建有教堂、医院等设施,人口最多时达1200多人。当时,中国、日本乃至东南亚的海上商人都到双屿岛进行贸易,这里形成了一个类似国际贸易的港口。这个地方后来被日本学者称为“16世纪的上海”。双屿岛上葡萄牙人所建的设施被明朝军队铲除后,葡萄牙人才开始在澳门立足,并将那里经营成中西交汇的据点。



关于澳门的兴起与双屿岛的衰落的研究成果很多，尤其以澳门和欧洲的学者为主，从中可以看出双屿岛与澳门实际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从更高的层面来看，那便是江南与岭南的关系。1793年前来中国谒见乾隆皇帝的英国马戛尼尔使团所提出的六条要求中，提及了4个涉及自由贸易的地方，分别是广州、宁波、舟山和天津。它们一个地处岭南，一个地处华北，另外两处位于江南。使团指明要清政府将舟山提供给英商居住和存放货物；之所以会提出如此明确、具体的要求，是因为这几个地方都是中西交汇最为便捷的所在。

二、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差异性

江南与岭南发展的共性是两者均受中原地区持续不断的影响。不管其背后动因是什么，两个地区的文化都是从北方不断南下的中原人和本地原居民的文化交流融合中产生的，它的影响程度从北到南呈一个梯度效应。唐代的江南已然相当富足，韩愈对那里有不少描写。那时候的苏州、杭州、扬州等江南城市已十分繁荣，而同时期的岭南仍有不少地方比较闭塞、落后。韩愈笔下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当中描绘的便是当时仍为蛮荒之地的潮州。

苏东坡的三次贬职：第一站是黄州，时年44岁；第二站是惠州，时年57岁；第三站发配海南儋州，时年62岁。其贬谪之地逐渐由靠近中原到远离中原的南方，一站比一站远，越往南越荒芜。那个年代遭受谪配的人远不止他一个，只不过苏东坡名气大，家喻户晓。由此也可推断，宋朝官员的谪配路线大多沿此方向。依《广东通志·谪宦录》，从东汉到明代，共有271位名人被贬到岭南，其中唐代至少有127位^②。

每当中原遭遇战乱，北方居民便不断向南迁徙，因为南方局面相对和平，更好开发。岭南这个远离国都的地区战事最少，因而成为北人南迁最主要的目的地。

明代以前，相对于距离中原更近的江南地区，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但也有其后发优势。深知自身的不足，岭南人虚心向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学习，取长补短。到了明代中后期，岭南地区以广东为代表，便逐渐跟上时代的步伐。到了清代，广州已然跻身中国领先地区的行列。

差异性的另外一面，是岭南接触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中东文化乃至欧洲方面的西方文化比其他地区更早、影响更大。岭南地区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通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秦汉时期。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发现的舶来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异域。唐宋时期，广州的中外交往更加频繁。在唐代鼎盛时期，广州藩坊规模空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比江南任何地区都要深。宋元时期，广州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明清时期，广州的贸易对象主要来自欧美。耶稣会最早在明代到达澳门，彼时的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曾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是当时中国与西方接触最多、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从对外联系的角度看，同样存在一个梯度，即唐以降至



清代，中国对外联系程度的梯度自南向北为广州最深，福建次之，江南再次。

我们可以将差异性的两个梯度综合起来看。就受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影响而言，江南地区比岭南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更早、更深、更广，影响程度按照中原地区—江南地区—岭南地区的梯度自北而南逐渐递减。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言，岭南地区比江南地区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早、更深、更广，影响程度按照岭南地区—江南地区—中原地区的梯度自南而北逐渐递减。

三、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互补性与交流融合

到了近代，随着轮船、火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广泛应用以及中西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趋频繁，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的文化便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入的交流、互补和融合。

随着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上海最早的一批买办和最早开启洋务运动的实干家，几乎全部来自岭南地区。像容闳、唐廷枢、唐廷桂、徐润、郑观应等，他们发展的路径无一例外皆起于岭南、成于江南。中国最早提出维新思想的人几乎都来自岭南，包括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何启、胡礼垣等。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江南人王韬，但其实他提出革新思想的最集中的时间和地方是身处香港的时候，从本质上而言是在他作为“岭南人”期间。

站在另一个角度，维新思想呈现和发表最集中的地方是江南。无论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成书，还是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发表，特别是由后者任总主笔、集中反映维新思想的《时务报》，都在上海。从这个角度而言，维新思想起于岭南、成于江南。

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崛起于岭南。兴中会的成员如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大多为广东人。但反清革命的成果最终是在华中和江南等地实现的。上海光复起义对于反清革命的成功可谓至关重要，是整个辛亥革命中的“关键之役”，这也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反清革命同样起于岭南、成于江南。

笔者认为，近代中国的三大思潮和三大运动几乎都起于岭南、成于江南。岭南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早、最深、最系统，容易孕育出革新思想；而江南经济文化发达，人口众多，实力雄厚，适合沉下心来思考和酝酿行动。从发展规律的角度看，岭南能够提出新的东西来，但沉思和发展的过程却在江南。

再往后看，作为近代中国百货业标志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其发展历程也是如此。它们的创办人皆来自岭南地区，但最后的商业成功都发生在上海，即成于江南。只不过到了民国时期，上海的工商界、文化界已经很难将江南人、岭南人截然区分开，两者在许多方面已经浑然一体。在民国时期的买办中，江浙人同样有出色表现，比如，宁波买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来自广东香山的买办。在工商业领域，江浙人因为人数众多，在势头上已经超越岭南人，成为主体部分。当然，一方的优势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



在持续的发展变化中。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一大批江浙企业家和文化人，如包玉刚、邵逸夫、董浩云、王宽诚、查济民、唐君远、查良镛（金庸）等，陆续南下香港谋求发展，并最终在那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企业家重新北上到上海发展，从原先的“孔雀向岭南飞”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孔雀又向江南飞”。在南来北往的社会变迁中，这批企业家和文化人善于观察世界风云变幻，善于在变化中寻找不变，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营商环境和文化环境。

无论是江南地区还是岭南地区，它们都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它们是全国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重要基地，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共同担负着排头兵或领头羊的重任。

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都是我国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富有创造性、充满活力的文化。从全球的视野、全国的广度、历史的长度和比较的角度研究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意义非凡。

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都是范围较广的地域文化，而每一种大的地域文化内部都会存在更小单元的地域文化，这些细分的地域文化之间也有着显著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比如，江南文化内部的苏州和杭州之间、苏州和扬州之间、南京和杭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岭南文化内部板块、结构差异更是明显。例如，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各具特点；广东文化内部又可细分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

从地理空间看，既要看整体上的共通性，又要看细部的差异性；从历史进程看，既要看长时段的变化，也要看短时段的发展。通过将长短大小相结合，可以从不同的范围、层面、角度和时段研究，发现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色，加深对它们的理解，重新理解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如何融合、发展、创新这个更大的命题。

左鹏军：岭南的江南记忆和文化理想

江南和岭南的关系或者联系，一方面是相通性，另一方面是差异性。尽管不同的时期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但总体上江南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域性形态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宋代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直到近代以来。

一、从江南到岭南

（一）重要官员

中国封建时代的重要官员特别是文化和学术修养较高的官员，他们对于岭南的影响十分重大。比如阮元任两广总督期间，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教育上，对岭南做出许多重要



贡献,包括学海堂的创建,对于清中叶后期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岭南学术、文学乃至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阮元本身拥有经学家、小学家、文献学家等身份,同时他是江南的扬州人,必定受到扬州学派的影响。

翁方纲虽为河北人,但他在担任广东学政期间,得益于自身的修养加上在诗学、考据等众多领域的历史贡献,对岭南地区的众多方面贡献良多。不管是诗学领域还是金石书法,翁方纲均受到江南诗文传统、书法传统、学术传统的影响。

张之洞与广东的关系更是密切,尤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创办的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今广雅中学)。张之洞在广雅书局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岭南刻书以及文献的积累和传播。

(二)重要家族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重要家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江南迁徙并到落籍岭南后才逐渐成长或者发展为文化史上的重要家族的。比如番禺的汪氏,广东的叶氏、沈氏、邬氏等。岭南地区的其中一位重要的经学家兼小学家陈澧,其祖籍为浙江地区。重要人物和重要家族的迁徙和落籍有着深刻的关系和深远的关联,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是研究江南和岭南文化学术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交往(朋友圈)

其实江南人对岭南地区的关注对于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包括被认同、被尊重、被赞誉,都起了很大作用。唐宋以前,岭南相对落后,因而成为唐宋两朝官员们被贬谪之地。比如屈大均,他一直与顾炎武、朱彝尊等人保持交往。众所周知,顾、朱二人在当时的学术和文学领域有着较高的地位,其影响力和意义不仅限于岭南。还有潘耒,他深情地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作序,无疑是后者在知识性和诗性著作方面的知音。对于屈大均的为人学,后来的龚自珍、谭献等人也有着极高的赞誉。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的文化史经验,笔者称之为互相珍惜、互相成就,当然也是一种如切如磋的友谊。

必须承认,岭南地区的传统学术是后发的、迁移性的、借鉴性的。当然,它学习的对象不仅仅是江南,还有其他广阔的地方,特别是中原地区。但是,江南学术对岭南学术的影响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江南学术在宋代以后一直处于中国学术最为核心的地位。譬如,在岭南经学的发展历程中,许多思想因素或者治学方法深受江南传统经学的影响。

然而,岭南学术的后起并不意味着它的价值不高,也不一定意味着延续性不长。后来随着澳门和香港的兴盛,港澳地区成为中国传统经学的重要传承所在,这对于台湾地区的经学发展和影响也非常深。

从理学方面来看,陈献章对于明代心学思潮兴起有着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贡献,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陈白沙弟子众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是湛若水。加上陈白沙与王阳明之间友好的关系以及两个人都身处高位,他们在学术上互相影响、互相启发,其弟子也相当于互为交换生。陈湛之学、阳明之学的共进和互相砥砺、共同发展,推动了整个晚明时期心学思潮的兴盛,影响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尽管黄宗羲认为,王阳明一直不愿



意承认陈献章对自己的影响，但王阳明的思想通过湛若水进而深受陈白沙思想的影响同样是客观事实。这一现象可被视作江南文化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或反哺。

陈湛的学问，特别是湛若水的学问或者学说及其与王阳明心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文化史上特别是江南和岭南的文化关系上富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事件。类似的还有小学、乾嘉学风等，其实江南的小学对于岭南学术的影响也十分直接，代表性人物就是陈澧。

(四)文学文艺

江南的文学自唐宋之后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一直处于中国文学的最高位。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最经典的文学作品大都产生于江南地区，或至少与江南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江南文学成为岭南文人、岭南文学所追求和向往的目标，岭南文人如屈大均等一直把江南的文学作为典范和目标来学习。

苏杭的刻书一向以精美、丰富著称，对于清中叶以后开始兴盛的岭南刻书业影响颇深。此后还有文献的积累、总集的编纂，包括别集的编撰（如南海谭氏和伍氏藏书），文献意识和经营意识的增强及两者的结合，教育，等等，还有陈献章办书院，无不深受江南文化特别是湛若水、王阳明等人的影响。

岭南与江南的书法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时至今日，西泠印社依然是中国规格最高的书法篆刻艺术的代表。岭南画派在一定意义上取法于江南文人绘画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它结合了岭南地区的风物和风俗，并运用西洋画的一些技法形成了自身的表现形式，在大胆创新与变革传承、融会与扬弃、传承与创新之间为文化史留下了宝贵经验。

尽管岭南的园林无法与江南园林媲美，但从地处岭南的四大名园中仿佛依稀能找到或者直观感受到江南园林的身影。江南园林的魅力之大，就连清代的皇帝也致力于将其复刻到北京。尽管算不上十分完美，但江南园林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的特性以及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变革，作为文化史上经常出现的现象，对于江南和岭南而言同样留下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历史经验。笔者认为，能与上海石库门媲美的岭南建筑，当属岭南民居西关大屋。

在广州老城区长寿路、西关一带散落着一些老式的园林式宅院，它们往往是江南文人在岭南生活所留下的印迹。由此可见，江南文化是岭南文化兴起、成熟、演进、转换的重要外部动力。

二、望江南与忆江南

笔者认为，在岭南文化各个方面和不同层面，人们对江南星星点点的向往和追慕可能是岭南文化的一种理想。当然在不同的地区，如广府地区、潮汕地区、客家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各有不同。大致而言，以珠三角地区或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为主的格局里，江南文化常被视作一种典范的形态和杰出的代表，是许多岭南文人甚至普通民众所追求的目标，主要表现便是岭南地区各种深刻的江南文化印记。

一方面，岭南文化深受江南文化影响；另一方面，江南文化也是岭南文化后发乃至后





来居上的重要动力。当然,这种动力不仅来自江南地区,也来自中原地区及其他各地区、各民族,还包括香港、澳门的兴起以及西学、西方文化科技的东渐。

假如没有江南文化的启迪、影响和助力,明清之后的岭南文化会不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当然,除了江南文化,岭南地区的周边省份包括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地的文化以及开埠后的澳门和香港同样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就岭南的发展历程而言,绝大多数岭南人可以说都是外来移民,只不过大家成为“岭南人”的年代不一样,有些是在秦汉时期,有些是在魏晋时期或者南宋后期。岭南作为典型的多元化移民社会,无数岭南人的奋斗创业、不懈努力和共同发展无疑是最为内在、最为核心的文化因素和精神动力。

正是由于内部和外部、本土与外来、土著与迁移、东方与西方等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岭南文化在明清以降直至今日的蓬勃发展和全面提升。岭南文化在中华区域文化的总体结构里具有特殊地位,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其中,江南文化一直以来的启发和影响是非常持久的、重要的动力因素,因为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象征。尤其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清时期,江南文化成为中国大地最重要的地域文化形态,这种深植久远的文化渊源促进了岭南和江南之间的交流交往,互助互促,共同创造出新的文化,这可能是文化史上值得今人再三品味和汲取的一段历史经验。

江南的印记清晰地存在于岭南文化多个方面。一方面,这些印记是江南文化启发和影响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江南与岭南密切交往、文化关系深厚的有力证明。另一方面,这些印记也是岭南自觉接受和有效吸纳江南文化的生动写照,是岭南得以迅速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后来居上之势的重要外部动力。这种互相成就、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频繁交往、深刻关联、共同发展的经验,是我们思考和总结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关系的重要因素。

江南文化,特别是江南意象、江南学术、江南文学艺术、江南建筑、江南日常生活、江南情调、江南气质等,是许多岭南人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典范,也是一种文化追求和文化理想。在很多方面、很长时期,江南文化作为中国学术、中国文学、中国艺术等领域的重要代表对岭南文化影响之深远,甚至在一些时候成为岭南人的精神寄托和努力方向,其经典性、长久性和理想性价值成为引导岭南文化继续发展、继续追求的原发性方向。时至今日,江南文化的这种经典性和理想性的痕迹仍可在岭南文化中觅得。

中国古典诗词词牌中有一首很短的词叫“忆江南”,也叫“望江南”“梦江南”。这种追忆、眺望与梦回,道出了包括江南文人在内的许许多多中国文人特殊的思想寄托和梦幻式想象,从某个角度反映出江南对于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文化所产生的极其深远的影响。

广东藏书家黄荫普先生编纂有《忆江南馆藏书目录》和《忆江南馆丛刊》。这种对于江南的记忆、寄托和追寻当然不仅仅属于黄荫普一家一族,更属于无数岭南人。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联系、交往和历史的启迪不仅属于悠远的过去,也关涉蓬勃的现在,更指向遥



远的未来。

蒋述卓：“新南方文学”——人文地理学的新探索及其理论意义

自古以来，文化之间的迁移和流动都十分频繁。岭南文化与江南文化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关于“新南方文学”的探讨正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近两三年开始流行起来的“新南方文学”与去年兴起的“新东北文学”一道受到文学界乃至社科界热议。2022年，“新南方文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十大热点之一，学界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讨论地域文化如何寻求突破。广西首先提出“新南方写作”，但笔者认为，“写作”指涉的范围过于宽泛，就文学本身来谈文学可能更为合适，或可将其定义为“新南方文学”，包括广东、广西、福建等“南方以南”的范围。

说到“南方以南”的“新南方文学”这个概念，笔者最先想到的是广西资深作家陆地的一本小说——《美丽的南方》。是否广西老一辈作家写的文学就叫做“旧南方文学”？现在的“新南方文学”如何区别于原先的“旧南方”？“旧南方”指的是哪里？过去人们讲的南方大都指引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南方，它同时可以覆盖岭南地区；而现在提出的“新南方”指的是“南方以南”，它不仅区别于“江南的南方”，而且专指沿海地区的南方，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甚至还有一些声音认为可以覆盖至东南亚地区。比如，哈佛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王德威提出，东南亚也属于南方以南，但考虑到这样定义“新南方”超越了一定的政治地理边界，不一定合适，因此不列入本文探讨的范围。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尧教授认为：“小说已经陈旧了，我们要有一场新的小说革命。”文艺界希望借助这一热点带来突破，“新南方文学”所倡导的人文地理学新探求则希望突破原来的“旧南方”范畴，因为原来一讲南方文学往往指引以江南地区尤其是江浙地区或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文学，如王安忆、格非、毕飞宇、苏童等作家的作品，而“新南方文学”寻求的是不同于前者的、“南方以南”的别样风景。

针对“新南方文学”的写作，中国人民大学杨庆祥教授归纳出四种特性，即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和经典性。其讨论主要集中在《南方文坛》《广州文艺》两本刊物上。从人文地理学角度，与“旧南方”以江南为中心有所不同，“新南方”定格在“南方以南”，标识出的地理范围大致位于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甚至包括云南、贵州和四川。云贵川三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南方以南”的地理范围，中国当代作家艾芜就曾到访云南并写下《南行记》《南行记续篇》等具有地域属性的作品。

“新南方文学”涉及空间与文化的想象，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文学的想象共同体，当然它也孕育着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创造。从文学地理角度看，它包括空间的语境、地理的批评、地理诗学，即存在着一种有待突破的新的文学创作理论。



因此,评价“新南方文学”的着眼点并不是其地理概念,而是其文化意义、文学革新的价值及其所蕴含的文学理论意义。从文学事件的角度来分析“新南方文学”必须具有“独异性”,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既是,也不是。“新南方文学”既是南方文学,又不是南方文学,就像佛教里讲的“非有”“非无”一样。从广义上讲,它是南方文学,但在地域上确实与江南文学难以区分;之所以提出“新南方”,是出于“我不是它(江南文学),我要有所疏离,要建立自己的意义”。“新南方文学”是一个特殊的、异在的事物:它既疏离于江南文学,表现出反叛精神,又力求树立自己的风格,张扬自身文学个性,建立起“新南方文学”精神高地。

实际上,这是广东、广西的文学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在探讨的命题。那时的广东文学、广西文学是一种既想走出岭南,又想张扬南方文学精神的矛盾体,但同时又希望从这种对立中寻求突破。疏离和反叛只是它的表象,其内在是要树立自己的新南方格局,展现出空间语境二重性的异风景。

当前“新南方文学”的推动者提出要从岭南植物、海岛风情、乡中厂、城中村、都市科技等场景去勾勒“新南方”的异风景。比如,广西作家朱山坡描写了乡间的师公(“巫”在南方的一种称呼)文化。林白的《北流》是在上海《十月》发表的,它以北流这个小地方的语言来描写南方的意象,影响很大。林棹的《潮汐图》描绘了一只很大的灵蛙,讲述它如何从澳门流浪到欧洲,最后洄游到南方,令人惊讶的是这只蛙竟可以说人话。厚圃是旅居深圳的一位潮汕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拖神》以潮州的“打神拖老爷”为背景讲述历史家族的故事。作家葛亮是南京人,他去到香港以后写了《燕食记》,是一本关于广东菜和本帮菜相互间交融以及工匠传承的长篇小说,本质上是关于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的交织,只不过南方作家笔下的文字更具有南方意义、南方风格。

王德威教授说过:“‘新南方文学’是‘南方以南’,潮汐起落,山海撞击,华夷夹杂,正统消散,扑面而来的是新世界、新发现、新风险”。南方充满挑战,“新南方文学”因而必然要具备南方意象、南方气象等南方精神。

站在未来的视角,“新南方文学”在理论上、实践上具有怎样的意义?笔者在评林白的《北流》时说过,重要的不是看作品的地理、植物、风俗和语言,小说更多是在多元文化形态环境中形成的。它涉及作家和艺术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及表达世界方式的新变化,代表着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无穷的探索。这部作品的叙事具有开放性,面向更宏阔、更前瞻的领域,体现出一种崭新的文学经验,展示出作者丰富宏奇的文学想象力。站在叙事文学想象力的视角,这样的作品是具有开拓性的。

海洋性是“新南方文学”最不易被混淆的特性,然而写海洋是冒险的。过去,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现在“新南方文学”从另一种新的角度,用博尔赫斯的文学资源去寻找对海洋的新的审美经验。比如,陈春城的《夜晚的潜水艇》以意念去驱动潜艇在海底运行,展开了小说恢宏的想象。林森的《唯水年轻》描写了海南岛历史上在地震中被淹没的海底村庄,但作者据此展开了文学想象之旅:一位摄影师到那儿以后,把地下的海洋和陆地上的村庄



信息联通起来加以呈现，这样的文学的想象空间，不同于旧南方文学的描写。还有厚圃等人的作品都超越了海明威的那种象征性的写作手法，运用了现代的手法，值得我们文学评论人去深入研究。

新的生活经验在带来文学想象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学观念，这是形成“新南方文学”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方还有不少新生代作家，他们打出的是“科幻牌”。南方的科幻小说已经超越科幻本身的意义，现在更多描写的是人的智能形态。比如，万一智能机器人与社会道德伦理之间产生分歧，人应该如何存在？如何处理好人与机器人的关系？这些思想由“新南方文学”所表现出来，完全不同于北方文学，也不同于江南文学，具有自己的特性。

像王威廉的《野未来》，里面描写的场景是如果没有指纹，人物的身份就没法辨别，其实作者本质上讨论的都是现实问题。比如，新冠疫情期间搜集个人生物信息、二维码等成为常态，现代人一旦离开了手机和二维码便无法正常生活。在《商城街的鳄鱼肉》里，人与鳄鱼交换，人保留了脑袋，身体则变成鳄鱼，尽管如此，在鳄鱼的身体的影响下，人变得凶残、失去道德底线，这时该怎么办？这些都是小说与现实相互交织的产物。陈崇正的《悬浮术》里也描写了科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叉。南方科技大学与深圳大学联合创作的原创科幻哲理剧《云身》探讨了碳硅基和硅基体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有意义。上述南方故事的例子都表现出新的哲学思考，即人类文明对于科技时代的思考。

还有新都市文学和新工业文学中所探讨的新的生活经验。比如吴君的《同乐街》描绘了城市经历改造、乡村变成城市以后，人们怎样从“二世祖”的“躺平”心态转向奋斗的心路历程。广东顺德有作家描写工业人在厨卫行业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创业史，这些作品都写得非常惊心动魄，代表着“新南方文学”的一种气质和新的思想观念。

“新南方文学”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复杂的、包容的、杂合的。它的跨域面比较大，像广东和广西虽然在地理上相近，但语言上存在差异，除了主要的粤语和壮族语言，还有各种方言、土话等，另外两地在一些宗教习俗也有所不同。如果将范围再扩大到中国的西南部地区，文化上的差异就更加大了。

还有港澳地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以及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杂合，也正好体现了“新南方文学”的特性。比如，金庸本是江南人，他在香港创造了文人武侠小说；还有葛亮，他的创作实际上逐渐从江南文化的家族书写发展演变为岭南文化的书写。葛亮的《燕食记》里不仅提到了上海的本帮菜和广东粤菜的融合，对南洋菜式渗入粤菜也有着墨，里面就写到南洋女子用其烹饪方法改良粤菜，这在现实的饮食文化中也有非常多的案例可循。香港文化中有一种很深的江南情结，以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为典范。香港邵氏影业的邵逸夫本来就是江南文化商人的代表，却在岭南创造出新的影视文化。有一本叫《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的书讲述了广东人在上海的发展，比如潮汕的一位房地产商人在上海创业时，其地位堪比“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可与之平起平坐；还有上海滩叱咤百货业的“四大巨头”创始人都来自香山（今广东中山）。他们的商业成功从上海一直发展



到香港,可见从20世纪初起岭南文化就与江南文化关系密切,商脉相通,而江南文化对岭南文化包括香港文化影响至深。以历史为切入点,从文学视角出发对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关系展开描写,同样是“新南方文学”特点的体现。

文学在流动中富有活力,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新南方文学”因而具有新的突破和创新的机会。文学界关注地域文化之间的交叉、交织和交流的现实,提出以地域为标识的“新南方文学”,旨在寻找新的突破和美学的创新,追寻一种新的美学理论。

唐力行:徽学研究与“南南”异同之思考

笔者早年从事徽学研究时,接触过三位岭南学者,跟他们分别有过神交(素未谋面,但在学术上相通)、一面之交以及深交。在与学者们交往的过程中,笔者不仅在史学研究上受到不少启发,对岭南文化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第一位学者是中山大学的戴裔煊教授。我俩素未谋面,只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拜读过他的《明代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本书让人眼前一亮,刷新了我对已成定论的倭寇海盗史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整个社会面临着对商人群体重新评价的问题。对于倭寇海盗,戴教授做出了全新的评价。他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时代始于16世纪”的论断,指出16世纪中叶沿海百姓(自然也包括海商)“不顾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海禁,出海从事正常贸易,正是中国社会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并以此作为探讨“倭寇海盗”反封建斗争的立论前提。他认为,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万历年间的倭寇海盗不是一回事。万历年间的丰臣秀吉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倭寇海盗,但嘉隆年间“倭寇海盗”的领导者是中国人,参加者也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只有少量的日本人参与,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利用官方恐倭的心态来进行海外贸易。因此,戴教授认为当时所谓的“倭寇海盗”其实是一些从事正常海外贸易的商人,只不过由于海禁时期不允许民间从事海外贸易,所以他们必须通过武力冲破海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倭寇海盗”海外贸易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笔者当时正在研究徽学和徽州海商,查阅了不少资料,盼望着向戴教授请教并做深入交流,可惜缘悭一面。

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上曾经把所有倭寇都定性为侵略者有当时的时代必要性和局限性;在改革开放到来时,学界进一步地澄清了嘉隆年间“倭寇海盗”的领导者和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人的事实,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88年底,笔者受中山大学邀请参加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篇题为《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的论文,后将其扩充为《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并于1990年刊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文章主要围绕戴教授对“倭寇海盗”的研究做更进一步的



探讨。譬如，为什么他们的海外贸易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为什么他们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联系在一起的？笔者认为，徽州海商的走私贸易，并不局限于远航海外的商人，而是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次是往来于大海从事商品交换的徽商；中间层次是徽州行商；外围层次是遍布于江南的徽州坐贾与手工作坊主。封建体制下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维系着海商经营活动的三个层次，使其成为一个产供销循环运营的整体。

关于海外贸易的性质问题。过去，学界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往往局限于生产领域的组织形式和雇佣关系。然而，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反杜林论》所述，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关系。流通与生产互为“条件”，并且与生产一起“构成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的规模受市场的限制。从宋代到明清，中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在此前提下，生产规模的扩大必须依靠海外市场。江南地区手工业生产的产品如丝绸、棉布、瓷器、铁器等都是海外市场的需求的商品。走私贸易的出现使传统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改变了生产方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与此相关的海外贸易因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属性。从明末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史家普遍将嘉隆年间的海商视为“倭寇海盗”，戴教授的新论断无疑将涉及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问题。在史学研究中，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戴裔煊先生以耄耋之年推出的开创之作《明代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为海商正名，其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勇气是可钦的。“倭寇之争”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学家首先必须有忠实于历史的勇气；其次必须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紧紧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勿以帝王之好恶为好恶，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客观标准。只有这样，史学才谈得上科学性，才会有不衰的生命力。

第二位学者是中山大学的黄启臣教授。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在安徽师范大学工作时，因参加“中国商帮丛书”的编辑会议而结识广东商帮部分的作者黄启臣先生。黄教授是梁方仲先生的学生。根据他的研究，在反抗封建统治的岁月里，广东商帮的反抗斗争绝不亚于甚至还超过汪直、徐海、许氏兄弟等徽州海商，并列举了广东饶平人林国显、张琏等人的事例。黄教授还提到，一直到清末，岭南人在欧洲、美洲、南亚等世界各地都建立起海外贸易集散地。与笔者所研究的徽商相比，徽商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更深，外在表现是对封建统治的抗争精神不及岭南人强烈。

第三位学者同样来自中山大学，是同为梁方仲先生学生的叶显恩教授。他是国内徽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其代表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作为徽学的开拓之作，影响十分深远。叶教授是与我有着数十年深交的师友。作为一位研究徽学的岭南人，叶先生撰写了《徽州与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对徽州与岭南的宗族做了比较研究，回答了为何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差别如此巨大以及差别的根源所在等问题。叶教授认为，江南



文化与岭南文化存在差异的根源在于明清时期两地宗族构成的差异。宗族是社会基层组织,对经济文化影响深远。徽州的宗族是因躲避战乱而从中原地区迁至江南的世家大族,当江南发生战乱时,宗族进而迁徙至距离江南平原地区最近且最安全的徽州山区。这些世家大族的宗族有三大要素——族地、祖坟、祠堂,缺一不可。其严格的父系血缘传承不能有丝毫混乱,因此徽商的宗族制度一直保持着与正统相一致,成为正统宗族制传承的典型。叶教授提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概念,即广东宗族是“虚拟宗族”。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刚刚发展起来,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鼓励开发沙田,但个人开发只能开发一小块,必须以宗族的名义才能获取大片土地。另外,由于当时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之间的竞争太过激烈,所以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制胜。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的宗族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由于广东原著宗族比较少,偶有一些北方迁过来的客家宗族,因此当地在明清时期出现大量自发组织起来的宗族。如果以徽州正统宗族的标准来衡量,广东的宗族根本不可能得到承认。在岭南的宗族尽管是同姓,但五百多年前未必是一家人,即不是由同一个血脉传承下来的,只不过为了开垦土地和经商的实际利益,他们才联合起来编族谱,挑选一位名人作为自己的祖先,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宗族。如今在广东乃至台湾地区,人们还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姓氏同属一个宗族的现象,他们之间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这在徽州地区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与江南文化相比,岭南文化受到正统文化的影响和传统条框的束缚更少,因而更具创新精神。所有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地域文化传承至今,其影响力是难以磨灭的。

注释:

- ①何思妍:《张薰华(1921—2021):贱尺璧而重寸阴,以“经世”之传统助学科之蕃昌》[EB/OL],2022年11月23日,<https://econ.fudan.edu.cn/info/1790/20821.htm>,访问日期:2023年10月26日。
- ②史怀刚:《岭南文化创造主体的历史生成及其创新精神》[EB/OL],2023年4月10日,https://www.sohu.com/a/665115221_161794,访问日期:2023年10月26日。

作者简介:

-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 蒋述卓,广东省作协主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 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丁力